

【理论前沿】

ANT如何讲述媒介与权力： 行动者世界的生成与运动

李 敬

【摘 要】在传播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中,媒介通常被看作是“非人行动者”,媒介与权力的关系也较少被提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与权力之间有着内在张力:一方面,重“描述的”理论与“批判性”的权力之间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对于媒介批判研究来说,ANT具有强大的分析潜能。传播学所关心的“媒介物”不能被笼统地看成一个整体,并非所有的媒介物就一定是“非人行动者”。一类媒介物的功能是“物质性的”,它参与进运动之中,维系、稳定现实世界;另一类媒介物的功能是“中介”,它是完全的行动者,并带出“新”的生成。这两类媒介物之间又交叉关联,对媒介权力的讨论在其中被具体坐落下来。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媒介;权力;物质性

【作者简介】李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出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京),2024.3.23~3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物质劳动’、符号实践与传播学主体理论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BXW054)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把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权力分析联系起来,也许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同时这种关联也是必要的。一方面,ANT被认为与“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ety)对立,因此和媒介批判研究间存在不容小觑的张力。批评者认为,拉图尔(B. Latour)曾明确了ANT的反批判立场,折射出乐观的政治多元主义^①;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梳理了把ANT接合进媒介研究的学术史,他指出ANT曾与媒介研究有长时间的脱节,关键就在于ANT对权力、诠释等问题的忽视,而后者正是传播学关注的要素之一^②。另一方面,有趣的是,尽管ANT被批评缺失批判向度,甚至有学者认为“把拉图尔和批判结合起来是件可怕的工作”,但ANT的引入“可能使得批判性媒介研究更强劲有力”^③;“虽然‘媒介的权力’经常是混沌难以界定的,但ANT为我们提供了精确的语言,使我们能够描述大规模的资

源不对称是如何形成的……当它的产出被嵌入到日常生活实践中时(如媒体),似乎就能构建出社会现实”^④。万隆(Joost van Loon)甚至察觉到“拉图尔与海德格尔在技术批判上持有一个重要的共同见解,即‘不把理所当然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的起点’”^⑤,这意味着ANT对社会性的先在之物的质疑。概括来说,ANT一方面被认为是与批判“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它的确具有分析权力等问题的“效能”。

如果ANT的权力维度是值得发掘的、有益于媒介研究的推进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媒介与权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不加以区分地、笼统地把所有的媒介物都称之为“非人行动者”?比如(未加分析地、先在地)把手机、游戏机、笔记本等都看作“非人”(inhuman),然后直接用行动者理论去处理媒介物?ANT究竟如何“谈论”权力问题,它和媒介研究之间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本文的研究分成

三步:首先,从拉图尔对ANT的四处容易引起的“误解”所做的解释切入,在总体上把握理论的要点(ANT的“是”与“不是”),勾勒出ANT权力分析的内在维度;其次,既然“Actor-Network Theory”的表述容易引起“误解”,那么就依托ANT的一个核心概念“行动者世界”(actor world)展开权力问题的分析,根据参与“世界”生成的运动过程的不同功能,尝试对媒介物进行内涵上的区分,扭转抽象笼统处理媒介物的困境;最后,再通过“行动者世界”的权力机制,分别对不同类型的媒介物的权力运作方式进行分析。

二、ANT的权力向度:以“四处误解”为切口

ANT被冠之以“反批判”的帽子,总的来说有几点原因:首先,ANT批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认为其忽视了经验(empirical)材料,用先验结构解释来替代真正行动者的行为^⑥,对这一点的强调也自然“伴随”了对“权力”保持距离;其次,在批评者看来ANT对“非人”的重磅引入,是对“人”的漠视,也遮蔽了权力问题^⑦;最后,批评者认为ANT仅观察、记录、描述行动者的行为,而不触碰社会现实,这是一种妥协的态度^⑧。这些批评是严苛的,而拉图尔又时常拒绝对一些批评给出直接回应,更激怒了批评者。当ANT遭遇种种“误解”,拉图尔通过对“Actor-Network Theory”这个表述本身的解释进一步澄清理论。

第一个“误解”是“网络”(network)。今天人们一看到这个词就会想到互联网,它的含义是通俗易懂的。但在二十年前,这个词却是新颖的,它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工具,对诸如机构、社会、国家等关键性的概念进行对抗;当所有人现在都认为自己知道网络是什么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所有锋利的边缘,从而沦为一个“宠词”。^⑨虽然拉图尔承认“没有什么组织是比计算机网络的连接更紧密、更遥远、更具强制性和战略性的了”^⑩,但这种互联网式的网络联结并不是ANT联结准则,因为行动者网络完全可以是非常局部的联结,并可以依赖情境而定。“网络”最可贵之处在于一系列的“转变”(transformations)的发生,它必定意味着“运动”与“生成”,而鼠标双击下的信息扩散则可以是无“熵”的意义传递,这正是拉图尔尤其反对的,甚至在理论上“蔑视”的无中介传递(unmedi-

ated delivery)。^⑪因此当下的“网络”一词所最常见通俗的含义却恰恰是ANT不希望它所具有的。^⑫

第二个误解是“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这个整体性的表述方式,因为它看上去很像社会学关于“行动—结构”问题的陈词滥调,ANT无意于卷入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纷争之中,也不想对争执不下的老问题提出什么新的解决方案。在ANT看来,二元论无法调和的根源在于对“社会”所持有的错误理解,“社会”并非源于微观的个体或宏观的结构,而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流通中的实体”(circulating entity),不是某个行动者具有某种行动性,而是当“你”与“流通中的实体”相联结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获得一部分的意识、主体性和行动力。也就是说,当你成为“行动者”之时,并不是因为构成“社会”的那个整体性观念与原子的个体之间发生了随机的组合,从而获得了微观层次的你的观念,而是一种“局部的”联结所带来的“成就”。社会是在永恒的“流通”中、在无数局部的联结中、在对多元要素的动员、收编、对抗和策略中被生成的实体。

在ANT看来,宏观与微观、结构与个体的二元,一方面是把“社会”设定成“大写的”,错误地把“局部的”“地方的”“具体的”互动经验看作一种整体性的“巨兽”;另一方面,ANT也对微观的、匿名的力场没有兴趣^⑬,但拉图尔的表述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福柯的权力观,福柯对生命政治权力的讨论是坐落并穿透进具体的、微观的、力与力较量场之中的,拉图尔似乎在反对福柯的权力观。其实不然,拉图尔在这里并不指涉福柯,他只是强调ANT不陷入宏观和微观二元的陷阱之中,ANT所考察的“局部”与“微观”,它同时也总是“宏观”的,因为“局部”永远是在被“整合”(summing up)与“框架化”(framing)的总体性进程之中,“小”与“大”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ANT描述“世界/社会”的生成,它要去揭示“大”,但这种“大”并非是“统治”和“掌控一切”的“真实的大”,而是对所有的局部和中介进行的强联结和关联。^⑭因此,ANT对微观的局部的权力运动的考察,不是“停留”在局部,而是通过靠近局部而理解整体世界的生成。

有研究者指出,ANT抓住了一直被“傲慢的”批

判理论所忽视的“小美”(small beauties),这是ANT的“魅力”所在,但批评者认为这种“小调”(minor tone)式的诱惑只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是对“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a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的回归。^⑤在拉图尔对“误解”的澄清面前,此类断言的“有失公允”便一目了然。如果说日常的、经验的“小美”得以重返是理论的魅力所在,那么这种“魅力”不应与“小调”划上等号,这是强行把ANT拉回到二元的无解纷争之中,且不恰当地给ANT贴上“微观”的标签。ANT在根本上是一种网络的“拓扑学”(topology),它不关注、甚至不承认对象的固有属性,而只看重如何用点和线去描述多个对象在实际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如拉图尔所言,“行动者”(actor)和“网络”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就像光波与粒子的关系一样:社会是一个永恒流通的实体,在其中,不存在没有被“框架化”和“整合”设计中的“微观”,也不存在结构性的“宏观”,只有“整合”下的“局部”和生产出各种“局部”的“整体”。^⑥至于对经验的、局部的关切是否就意味着对现实的妥协,这个问题必然关涉到理论如何理解权力的问题,后面还会具体谈到。

第三个“误解”是“理论”这个表述(ANT的“T”)。ANT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更是一种方法,是一种“粗糙的”(crude)方法,因为它从不试图以某种深邃的洞察力去“解释”社会如何对行动者施压、行动者如何受到外部权力的强制操控等,而是要跟随行动者、从行动者处去学习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会有做出哪些行动。拉图尔甚至表明ANT应避免使用“研究”(study)这个词,它有着很强的“解释”(interpretation)的意味,而“解释”意味着对实体和本质的某种先验定义。相反,ANT是要去看行动者们是如何“部署”(deployment)出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个“行动者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定义是由行动者们以自己的语言、尺度和规则去实施的,而绝非是由学者们以某些先验概念和理论去界定它。^⑦ANT要做的是让研究者真正走进现场,从一个局部走向另一个局部,在这场田野调查的“旅行”中去理解“行动者世界”是如何由行动者自己所构筑出来的,去绘制行动者在构建世界的行为中相互协调、

共谋的过程;当然,也包括了去目睹多个过往行动者世界的崩塌。

ANT对“部署”的描绘很自然地让我们又一次想到福柯。福柯的系谱学明确了“部署”的概念,“部署”是一切异质要素诸如制度、法律、论述、手段、科学等的聚合体,是由这些要素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系统,是联结的本质。^⑧权力规训—治理的“部署”策略是在最微观的层面去控制人的肉体与灵魂^⑨,“部署”绝非某个大写主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控制^⑩,而是在局部的、经验的、微观的空间中各种力量的汇聚。“行动者世界”是多元行动者的力场的结果,是“部署”的空间实践,让一次次的永无止境的“流通”(circulations)成为可能。尽管拉图尔避免直接谈论权力,但ANT不可能不触碰权力的问题,且它对“如何流通”的追踪必在实质上为权力研究做出贡献。

最后的“误解”是行动者—网络之间的联结符“—”。除了第二点提及的被误卷入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二元纷争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作为一个占位符同时联结了“人”与“非人”,这也成为ANT饱受非议的最大痛点。社会科学从来都研究“人类的”世界,“非人”与“人”的平起平坐严重挑战了社会科学一贯的底线。这在根本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自然”的理解问题—ANT质疑和挑战了现代社会理论的主流范式,不存在什么“外部的”自然、“内在的”心理学、“向上的”神学和“往下的”政治学这样的现代性分类,ANT把“现代”的认识论彻底改写为截然不同的“流通论”(circulating reference),由此ANT是“非现代的”(non-modern),它考察的是流通空间(circulating space)或流体(fluids),即所有现实的集合物都是在不断地流通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transformations)。同样,主体性也是一种流通的能力,它通过与某些局部的实践相联结而得以增进或遗失,我们越是“卷涉进”世界之中,我们就越是能获得更多的主体性内容;更进一步说,政治实体也可以摆脱认识论被把握为某种类型的“流通”^⑪。在ANT看来,区分“人”还是“非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要紧的是看这些“异质”配置(agencement)中如何发生流通、与谁发生联结、每一次“汇聚”是怎样形成的,“如此这

般”的“社会”现实和“自然/科学”现实就是一场流通运动的结果。

现在我们尝试勾勒出ANT“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

(1)ANT中的“社会”是“流通的实体”，是一个生成的、运动的过程；

(2)ANT中的“网络”是经验的、局部的联结，它是考察之后的被呈现出来的那个“结果”，是“运动着的能动者所留下的痕迹”^②；

(3)ANT中的“人”与“非人”都是被平等对待的行动素，它们没有先在属性，而是在互相联结中获得自身的定义，ANT要去考察它们如何联结，使得联结成为可能的“部署”是什么；

(4)ANT不是宏观理论，它反对用预先的结构去解释社会构成，没有凌驾于个体的整体；

(5)ANT不是微观理论，没有不被“框架化”和“整体化”的局部；

(6)ANT不是一种致力于解释深层原因的理论，相反，它是“扁平”的，一切都在表面、需要观察者去追踪和描述。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尝试发掘ANT内在权力向度的特点：

(1)ANT必然关照权力问题，“权力”是一种力与力的联结、较量、妥协的实践，它必然涉及到“装置”的策略，即异质的、多元的行动者之间如何建立联结，并在联结之中构建出一个行动者的“世界”；

(2)ANT还关照权力运作的物质性层面，因为ANT是以关系的联结来定义物质存在的。因此，现实世界的生成必然是物质要素与人类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ANT是描述的方法，但在行动者自己构建的“世界”中，特定的联结关系创造出特定的世界，某种联结成为可能，必定意味着某些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的强力、对其他联结方式的排除和抑制。因此ANT不止步于描述，也必然呈现出其他可替代的途径，表明了ANT并不是“去政治化”的理论，它具有“政治功能”^③；

(4)ANT视野中的社会现实，就是无数个被“成功”“生成”的行动者“世界”，同样，“世界”也会崩

塌——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改头换面得以发生。无论是“世界”的生成还是崩塌，都与其中的权力关系的联结方式紧密相关。

三、“媒介物”与权力：对行动者世界的“简化”机制

既然“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表述有颇多“误解”，我们就选用更“准确”的表述方式——“行动者世界”。这也是在ANT理论前期所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术语，虽然后来拉图尔较少使用整个术语，但他也以分散的表述方式在很多文献中提及“行动者自己所创造的‘世界’”。

世界既是宏大、遥远的，又是日常、熟悉的，也许生活在某地某时期的人们会这样描绘他们眼中的世界：新能源技术取得不断地进步，并在民用生活、城市交通等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其市场份额；城市规划很重要的一块是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和完善；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城市交通新规；私家车对于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出行便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有了极为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对私家车的需求也无关轻重)；因为优惠措施激励，人们更倾向于购买新能源车或其他；地球环境因为汽车尾气的排放而变得很糟……

这是一个“客观的”世界吗？

——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阶段、自然环境的变化等，这似乎是“客观的”；

这是一个“主观”感受的世界吗？

——人们的消费需求、产品选择偏好，这似乎是“主观的”；

这是一个“宏大的”世界吗？

——技术如何、自然如何、人类居住环境的发展如何，这似乎是“宏观、遥远的”；

这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吗？

——人们需要什么、选择什么产品、日常生活出行如何，这似乎是“微观、日常的”。

那么，它一面是“客观的”“宏大的”的世界，它似乎是一个外在的宏大机器，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另一面又是“微观的”“主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它似乎关涉到每个人的喜好、习惯、价值观和琐碎的日常。在ANT学者看来，这个世界不是“外在的”宏观、也不是个体互动层面的微观，它不是可以被某种社会理

论“解释”的对象,也不是由科学技术“客观”推动发展的世界;相反,它是一个“行动者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静止的、预设的、单纯的,而是依赖于所有异质要素——人和非人——所构成一组特有的联结(association)方式,由此才生成了“如此这般”的世界的样貌。当联结发生改变,准确说,联结的要素和形态发生了变化,世界也就随之改变。当技术以“确凿权威”的方式显现之时,它实则已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运动过程,在联结中完成了多次对自身的界定,从而才得以作为一个确凿无疑的“结果”在运动的终点处展现。技术物一方面作为参与联结的非人要素,支撑起“世界”;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又决定了技术物的多样性和范畴,固化它的概念界定。^③有趣的是,一旦作为运动结果的世界已然被生成,人们就完全遗忘、忽略或刻意抹去它在运动中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权力的诡计、策略和痛苦的博弈,这个世界得以生成的历史被忘却,^④所剩下的只有消费者、技术、政府部门、商业、工厂等这些看上去“自然而然”的事物。

在前文中我们总结出 ANT 必然关涉到权力问题,它摆脱了“容易引起迷惑”的“传统术语”的整体性权力^⑤,权力的奥秘被锚定在运动的“联结”之中,谁是赢家?怎样的世界能够被构筑?取决于谁能够联结最多数的、不可逆的要素,把原本四处分散的要素融合为一个整体,让差异性的意愿变成等同的、一致性的(equivalent),谁有能力“支配”(holds)这种等同性,谁就掌握了权力的奥秘。^⑥而媒介物,正是在“制造最广泛、不可逆的联结”的“奥秘”中扮演起重要角色。需要表明的是,“媒介物”并不是 ANT 中的一个常规术语,常见的是“物质/物质符号/物质要素”“非人/非人行动者”“中介”这些表述,且侧重点各有不同;而传播学要讨论 ANT 视野中的“媒介物”可能是什么,就必须进入“行动者世界”内部的权力运作机制中去发掘、把握住它的功能,从而才能做出界定。

(一)第一类媒介物:“物质化”的媒介物——进入联结的运动

世界不是既定的,而是由行动者们自己所构建出来的世界。能够被称为“行动者”的,就在于其具

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可以让其他要素依赖于自身,并将它们的意愿转换为自己的语言。^⑦那么如何团结最广泛的要素,且获得最稳定的联盟?具体来说,比如在 ANT 最经典的扇贝湾案例中,我们通常最为熟悉的是作为“非人行动者”的扇贝;但在扇贝这个“非人”能够成为“行动者”(actant)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叙事:在这个“某扇贝种类可以通过幼虫自动锚定从而得到物种保护”的“世界”的生成中,有关“扇贝自我锚定”的知识从无任何先例的“荒诞错误”到成为经过科学论证的确切知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这也是一个世界生成后的“结果”——关于自然的知识和技术。“扇贝”要想“行动”起来,它就不能仅保持扇贝的原面貌不变——三名试验研究者既不能把湿漉漉的扇贝捧到会议现场展示给他们的科学家同行,也无需把海中的锚定器和植物和纤维混编网展示给渔民,这样做没有任何现实可操作性且是完全无效的,因为贝类、锚定器本身“什么也不是”,它们没有任何“力量”去动员“联结”的发生。

扇贝之所以能够是非人行动者,在于它言说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是可以自我锚定的”!部分扇贝幼虫“自愿”进入锚定器,在“舒适的”网中躲避水流、天敌和渔民,从而实现种族的自我保存。扇贝何以可能不再“沉默”,而“说出”对自身身份的界定?因为部分锚定的扇贝“代言”了整个沉默的扇贝种族,“扇贝的锚定就像选举投票一样,幼虫锚定数量就等同于选举投票的统计数。”^⑧因此,这种“投票式的代言”必然要求“物质化”转变的发生,从“扇贝”到“锚定幼虫”再到“变成物质的图表和数据”,扇贝才得以“动员”其渔民、科学家群体,使得原本静止的实体开始位移流转(displacement)起来,构成联结,成为一个力的整体,这就是 ANT 中权力策略的奥秘。“图表和数据”还需要被继续“物质化”为一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经由一整条常常的“联结”,扇贝才得以真正“进入”会议室,成为“非人行动者”。因此,在 ANT 的运动视野中,我们把 PPT、论文、研究报告、宣传册、各种数据资料、会议室称作“媒介物”时,它意味着重要的“物质化”(materialized)功能,必须经由这种“媒介物”的转变,“非人”才能够不再沉默、才

能成为真正的行动者,让静止的要素运动起来,让“联结”成为可能。

需要注意的一点,“物质化”不要与“非人行动者”混淆起来,不能僵化或狭隘地认为只有“非人行动者”才需要“物质化”;在“行动者世界”中,所有“联结”的发生都离不开物质化的中介,只有“物质化”才能让行动者世界获得持久性,否则,就只有像猩猩们所结成的社会那样永远处在快速更替之中。在ANT的另一个经典案例里,法国电力公司(EDF)一度作为最强力的行动者“创造”了一个“世界”:新能源电车、拒绝购买燃油动力车的消费者、电池新技术开发商、工厂、重视清洁能源交通的政府部门、支持EDF提案的议会……构成了那个“世界”。而让电池催化剂厂商、消费者、沦为配件供应商的雷诺汽车等“心甘情愿”接受EDF对现实图景的“解释与规划”,并把自己作为要素加入进“联结”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正是“物质化”的媒介中介:电池技术实验室的所有成果、EDF专家们对未来的“规划”……这些都被转化为铭文(inscriptions),诸如报告、备忘录、计划书、学术论文、各种文件等,它们发送出去并得到回应和执行;还有各种座谈会、学术会议等物质媒介形式,在这些活动中,不同的要素(当事方)亲身聚合参与,再结合上物资与资金的流转,“联结”才得以发生。权力就是“联结”的实施,EDF一度作为最强力的行动者,不仅仅在于它尝试组织和结构化联结的运动,还因为它确保自己能够拥有沟通和汇聚的中心,比如研究中心、会议大厅和建设设施等,这些中心专注并控制着“运动”的发生。通过座谈会、汽车测试、汽车模型建设、试运行和投资等,它扩展了“行动者世界”的未来,使“世界”获得了持久性。^③

媒介物的“物质化”功能在于发起“运动/位移”(movement/displacement)——让要素进入“联结”之中,从而“创造”出世界,或“改变”世界。当EDF所创造的由新燃料电池“一统天下”的“世界”使得燃油车制造商的位置岌岌可危,它就必然会遭遇抵抗,强力的“背叛者”将重新“改写”世界。雷诺汽车拒绝被征募为EDF驯服的要素,它要想把自己做成新的强力的行动者、去创建新的联结,就必须也具有强大的“物质化”媒介物的能力:重新计算各种实验数据,得

出新的实验结果,并能够将之转化为“物质化”的媒介,比如各类出版物、媒体发布会、各种组织活动形式等,让专业技术知识能够被消费者理解、接受和认同,以至于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要素,在新的“联结”中让诸要素获得新的定义,旧的“世界”彻底崩塌,人们看到并只记住眼前的“世界”,且认为这个“世界”的种种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历史内部的权力运动像一阵过眼云烟,消散干净。物质化的媒介物成就(accomplished)并巩固了“联结”的形态。

(二)第二类媒介物: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创造与生成

“物质化”的媒介物,是让联结的构型得以固化、稳定,让原本静止不动的要素能够运动起来、发生位移、进入联结,它是使行动者所发起的“征募”(enrollment)活动能够落地、持久的重要手段,但作为“物质化”的媒介物本身不一定是“行动者”,不能与“非人行动者”混淆。与之不同的另一类是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它必定也是“行动者”,ANT理论并不专门讲媒介物,而是讲“物质”,之所以“物质符号学”或“物质性”在ANT理论发展的后期受到极端重视,以至于ANT被误解只关注物而忽略了人,就在于“中介”可谓是ANT区分自身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关键命门,因此ANT必须强调“中介”性;再者,作为“中介”的“人”与作为“中介”的“物”之间又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很容易撤退埋进黯淡的背景之中、“缄口不语”,因此,对中介性的物的强调就自然而然成了ANT的重中之重。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另一类重要的“媒介物”正是要从作为“中介”的“物”之中来提取。

ANT把“传递”(intermediaries)作为“中介”的二元参照概念,“传递”只是无损地传输信息;而“中介”总是意味着“启新”,它必然会唤起某种“新的”东西,它是创造与生成的过程,是变形、破坏、调试、改变的发生,信息绝非被无损地传递,而是内置了“变”(transformation)的过程。因此,“物”作为“中介”,一定与物的“表征”(represent)相对立,报纸、印刷物、节日、徽章,这些物不是某种指称性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社会所赖以持存的根基:“如果你现在不举行节日或者不印刷报纸,你就会失去人群(the grouping)……”如此

这般”的社会群体,它“不是一个需要去修复的建筑物,而是一个需要被持续下去的运动”;ANT把“物”看成“行动性”(performative)的“中介”,而非“指称性”(ostensive)的符号,后者的对象是固定不变的,无论指称本身发生什么变化;而前者的对象则在它停止运动时就会消逝,就像舞者一旦停止跳舞,舞蹈便结束了,没有任何惯性将行动往前推进”^⑧。ANT的中介观在根本上是一种运动的视野,无论是社会或是科学,我们的整个世界,之所以被“如此这般”地呈现,就在于异质要素间“联结”的运动过程,而“联结”不是预先的安排,而总是充斥着“出乎意料”的行动。比如在扇贝湾的经典案例中,扇贝、渔民、科学家之间发生了多重联结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不可能提前预计、安排、打包好所有的一切事项,必然会有“意外之举”发生,扇贝幼虫进入了锚定器,实验者得以实现创新性的成就;扇贝幼虫不进入锚定器,“论证设想”失败;渔民同意科学家的建议、渔民毁坏了禁捕约定;科学家同行不支持实验者的提案、得到认同的科学“论证”……扇贝、渔民、科学家,它们都是“中介”,它们对自我身份的界定都是在发生相互联结之后的,“中介”充斥着“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能量,意味着“讶异”(surprise)“变”与“意外事件”(unexpected event)的发生,^⑨“新”在中介的过程中得以发酵、动荡、破土而出;ANT反对因果、效果、连贯与操控的逻辑,那是把复杂的权力部署揉搓成模糊的一团,把鲜活生动的每一次“事件”打入黑暗的背景。

即使在ANT的“论敌”迪尔凯姆那里,拉图尔也在文本中发掘出其对“中介”与“传递”差异的辨认,“必须避免将符号视为简单的人造物,相反,符号是构成事物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去掉氏族的名称和代表它的符号标志,氏族就不再具有代表性”^⑩。当团体徽章作为静态的“传递”之物,它只是对情感的表征,而当它作为“中介”,它就意味着对情感的“创造”与“生发”,这是运动启“新”的过程,物质性中介将群体感情粘合、固化、持存。

而“物”几乎总是作为沉默的客体,没有人会注意一架飞机,只有当飞机失事后的残骸将新闻记者、人群、媒体等都“聚集、组装”在一起时,飞机才跃升

为一个“中介”,它把一个“事实”(matter of fact)变成了“关切”(matter of concern)^⑪。人们终于意识到“物体以多快的速度翻转是它们的存在方式”^⑫、意识到现代“世界”的一个面相是飞机技术与交通、人类生命等所构成的某种形式的联结,没有位于“背后”的“社会/世界”,没有提供一切解释来源的“社会/世界”,也没有权力的隐秘操控,只有在对“中介”的追踪和描述中所显现的世界生成。但“物”要显露其“中介”性是很难的,通常只有在罢工、灾难或诸如博物馆藏品展示介绍、档案和回忆录等人为刻意制造的某些特殊场合,即只有在正常社会语境崩塌或非常态的、非社会性的人工情境下,“物”才得以成为“中介”,在聚光灯下讲述它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它们如何与其他中介相互联结,如何征募最多的要素,如何重要、核心与有效——它们终于“行动”起来了,它们所创造和参与的联结显现了……但这只是非常短暂的“可见”,因为这种乍现所依赖的情境是非常态的,因此它们将迅速退回黯淡的背景之中,再度沦为不可见(invisible)的、非社会(asocial)的“传递者”(intermediaries)^⑬。

理解了作为“中介”的“物”,“中介”的“媒介物”自然就清晰了。首先,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可以是“媒介文本”,但ANT中的“媒介物—文本”绝非静态,而是在改变、赋予行动者自我身份的运动的物。有ANT的批评者认为对“非人”所关注是物理上的“纯粹的”物质,而忽视了对作为“物质”的“文本”的考察,ANT理论也因此缺失了文化维度的关怀^⑭,恰恰相反,媒介“文本”理所当然构成“中介”之物的外延。比如在对于关于某种疾病的公众认知的建构中,ANT所看到的是“一个生成了关于疾病的自然事实与文化事实的那个世界”,患者也不再是被动的医学的对象,而是一个个自觉的行动者。他们与其他要素一起发生“联结”,自我身份的界定正是在某种特定的“联结”中获得的,而“新闻媒体”就是和患者一起发生特定联结的重要要素,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参与进对“行动者世界”的生成之中。林文源在对台湾肾透析患者的考察中发现,“这些媒体中介,是将完整且具原真性的病患存在,化约为片面的文字论述与悲情……这些再现中介不是个别病患的化

约或加总,它们实际上促成新的病患存在样能”,媒介实践“促成了一连串的改变……转化了病患存在的规模……个别病患的处境成为整个社会所认知的整体病患形象”^⑧,媒介“中介”了病患痛苦的存在,在病患与媒介的“联结”中,生发出“新的”病患存在的规模与样态。

其次,当作为“中介”的“媒介物”是媒介技术物,媒介技术物就必然不是一个仅传输信息的“传递者”,而是能与多元的人类行动者一起,发生真正的“联结”,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物与人类行动者都将获得它们自己的身份界定。以反向的例子来看更清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南方的几个技术援助项目中,怎样的“媒介物”不能成功地作为“中介”一目了然:一种用于西非教育援助的太阳能投影仪,其所使用的一种物质材料是“微缩胶片”,而缩微胶卷需要在专门的实验室里用特殊的化学药品才能冲洗,这意味着一名教师想在教学计划中增加一块新内容,他的课程就必须被送回美国的实验室;另外,在西非,上课是在白天进行,而专门用于夜间的投影仪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从ANT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媒介技术物,它无法与西非的教学要素“联结”起来、无法参与进它想要设计的网络之中;它的设计不允许修改和增加新的内容,这并不是物本身的“缺陷”,而在于其不能与其他行动者之间产生交互(interaction),支配性的权力被滞留在捐赠者手中,也就意味着投影仪仅是一个单纯的“传递者”,它不可能在网络中流动,也不可能带来西非的“回报”。^⑨

(三)权力的机制:两类媒介物如何参与进“简化”之中

对于“行动者世界”理论来说,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客体/对象”,而是由我们自己的行动所生成或正在生成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复数的,围绕不同的主题中心展开了无数的棱面,构成世界多元面向。对于所有的已经生成的和正在生成的小写世界来说,它都必须是被“简化”过的,或是正在经历某种“简化”——回到前述ANT的经典案例中,在EDF一度成为强力行动者的那个时期,“世界”被“简化”为“市中心+公共交通+中产议会+燃料

电池”:城市被简化为“市中心”(市中心的大问题是带来污染的公共交通系统)和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由中产阶级选民组成的议会,解决该问题依靠的是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这幅“简化”图景背后是EDF规划世界的逻辑:(1)EDF通过“讲故事”,即描绘一个城市的、后工业消费者所应对的新社会运动,从而做出“特定的”历史界定:在遭受空气污染的世界中,汽车才是构成当下世界极其重要的部分。汽车由此成为一个基本出发点,以此延伸出深远、激进的新能源技术的生产与消费诉求。(2)内燃机正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理应受到指责且需要对其他替代性的绿色能源进行论证。(3)以科技去引领和开启一个新的公共交通时代,这需要交由那些新社会群体、试图以科技改善城市居住环境的人来推动。(4)需要摒弃以私家车消费风格和能力来彰显社会分层的消费理念。(5)必须对新的化学电池的技术性进行科学论证和未来发展规划。卡隆把“简化”(simplification)定义为,它是对一系列具体的实体进行限定后,界定了实体的特征和属性,从而对无限丰富、复杂的世界进行了缩减。^⑩

ANT视野中的权力实践是从“what”到“how”的实质性跨越,权力总被社会学理论所描述,但从来不被探查,即行动者究竟如何构建出不对称性。^⑪不对称的权力,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能”,而是在“简化”世界进程中所生发的具体的、局部的、地方性的,同时又是整体性的运作策略。EDF对世界的“简化”一度能够实现,是依赖于特定行动素之间的特定联结,“燃料电池”“甘心退出内燃车主导市场转向汽车底盘生产的雷诺公司”“不以私家车消费为社会阶层划分的新观念的消费者”,只有当这些要素能够稳定的、缺一不可的并置(juxtaposition)成一个“network”时,“简化”才能作为“结果”被实现。ANT的权力观与福柯理论有着内在性的重要相通,当拉图尔与社会解释的整体性立场“搏斗”时,福柯作为最重要的“盟友”被征引:“在分解构成权力的微小成分方面,没有人比他更为准确了,也没有人比他更加批判社会解释(这里指总体性的解释——作者注)”,但是遗憾的是,“福柯一旦被转义(translation),就立刻被塑造成一个‘揭示’权力背后奥秘的人了”,这是彻头彻尾

地对福柯的“颠倒”。^⑩因此,对于福柯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在权力关系被微观、分散、局部、具体实践的层面,拉图尔当然认同,但在权力真实运作的层面,拉图尔很清楚福柯只是“讽刺性”(ironical)地使用这个概念^⑪,它是一个彻底的“乌托邦”,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仅以满足(像“发明者”边沁这样的)“偏执狂和自大狂的双重病症”而已。^⑫拉图尔特意选用希腊语“oligoptica”(寡视)以对立乌托邦式的“panopticon”(全景),指代这样一种权力实践,它“既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又是微小的数量”;乌托邦的“全景监狱”过于缥缈,ANT要做的是切实探查要素与要素如何局部的、现实的、“地景”地发生联结,比如抽象的巴黎社会权力被坐落、把握为“实地调查、问卷、统计局、学术争论、期刊论文、酒吧谈话和拨款申请书……”^⑬

“行动者世界”就是在“简化”的过程中被生成的,这也正是权力运作的进程,其中如何生成、对抗“不对称”信息是关键所在,也是上述谈到的“媒介物”之重要的权力运作机制。对于我们前文归纳的第一类“物质化”的媒介物来说,它们是世界的“简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EDF尝试进入一个对它而言全新的电动汽车的产业领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EDF需要重新完成对世界的“简化”,即把世界原本的自然属性和技术属性剔除掉,从而重新定义关于社会和时代的整体性。在这场强力行动者EDF发起的“简化”运动中,世界被简化为:后工业社会的、燃油车污染严重的、拥有新观念的消费者的、市中心公共交通是城市最主要问题的、电动汽车市场具有长足发展力的、用于制造发电机的电池催化剂技术是关键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文化(后工业的、环保的、反消费主义的),也有技术(电化学电池技术),但“文化”和“技术”都是作为“简化”运动的后果被生成的,而不是“客观/先在的”。换句话说,当“简化”成功,“文化”和“技术”的结果也就生成了,反之,当“简化”失败,“文化”与“技术”也将会是另一幅迥然不同的面貌。

“物质化”的媒介物支撑着“简化”的进程:EDF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必须“联结”行业专家,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传播关于社会历史的断言(后工业社会)和

观念(诸如反消费主义、环保等),这种联结之为可能,必须要有出版物、新闻媒体、学术会议等“物质化”媒介物的参与,才能真正实践观点的“位移”(displacement)——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为图像、文本、数据等物质要素,把分散的观点汇聚起来,把一次次等量转换的链条稳固下来。EDF不仅在意识形态的层面“简化”世界,也在技术的层面实施简化,“电动汽车”被选择性的视为“发电机”相关的技术问题,两者被画上等号,从而EDF在时间顺序(chronology)上规划了解决电动汽车问题的策略,先使用铅蓄电池到1982年;再到1990年使用镍镉蓄电池和锌空气循环电机;1990年开始,燃料电池技术准备就绪……世界栅格的时空网络被笼罩上权威、自然、客观的技术面纱,世界的简化通常在不觉知中被完成,一旦它得以完成,人们会视之为社会的自然史,所有的权力策略、诡计、博弈的流迹都将被抹平,留存下来的只有稳固的、物质化的作为结果的世界。而EDF对世界的简化却遭遇到雷诺汽车强烈的对抗,换句话说,雷诺汽车在对抗中完成了对世界的全新的“简化”: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如果能让锌蓄电池性能匹配上卡车的承载,可行的时间也比EDF设置的1990年要迟很多年之久……另外,EDF宣判了内燃机死刑,但雷诺汽车通过还原实验室的技术论证发现,使用电技术可以完善内燃机,使之在数十年内性能无与伦比;再者,被EDF看好的燃料电池却被雷诺论证催化技术短板,将之打入死局。世界被重新改写,新的简化生成了新的世界,行动者在这个新世界中重新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从而获得自我身份。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性媒介物当然不可或缺:实验室、记录材料、学术会议、出版物、宣传手册、媒体,它们作为“物质化”的媒介物,让新的“观念”得以发生位移、汇聚成团、固化、转化为联结中的真实实体要素,一个行动者之所以能够变的强大,就在于他能够牢固地联结起来大量的要素,力量就寄居在联结和被挑战、中断的权力关系之中。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由无数个“简化已完成”或“正在简化”的多重现实共同组成的,权力就是在“简化”的过程中的力联合以及遭遇到的对抗和改写。前文还分析过另一类媒介物,即作为“中介”的媒介

物,它和“物质化”的媒介物一样,都是“简化”进程重要的行动要素。在林文源对中国台湾肾病患者的ANT研究中^①，“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动图,它一帧帧跳动着,每一个局部的、细致的图景不断切换变化着,弱勢的患者也可以是主动的行动者,与“权威”所试图简化的世界抗衡:肾透析曾不被纳入台湾地区医保,世界被简化为无效医疗、机构的暴利、沉重的社会负担、有限的资源、应避免不公正的倾斜……透析患者在ANT的视野中是走出弱勢被动阴影的勇者,他们在医院、家庭、病患协会等各个空间中用透析医疗技术物、不被西医承认的中医疗法、宗教经验、其他辅助技术物、手册、协会名册,甚至死亡,去对抗“不公正”的“简化”,并努力改写关于世界的新貌。其中,作为“中介”的媒介物至关重要:病患协会、医院和患者等举办了“园游会”进行健康宣传^②,它绝非只是活动形式,而是重要的中介,因为“园游会”中患者的舞蹈活动等,“中介”了“肾病患者的身份定义”,并在“中介”中实践对霸权“简化”的抵抗,以及新的书写的可能——他们不是浪费社会资源的“无效医疗”的对象,而是有活力的、可以热气腾腾生活的人,该疾病应该、值得被“看见”、被重视、纳入社会保障。当然,这里只是极其缩略的概括,真实的中介展开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细碎、局部、需要漫长的积蓄。协会、座谈会、各种档案材料、刊物编辑、政策资讯整理册、宣传手册、新闻报道等,都是每一次中介实践的能量积蓄,媒介在这里不是“表征或再现”,而是对病患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对霸权的“简化”中原身份的推翻和重建,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在对世界的新书写中,通过建立新的联结关系从而获得自我身份的界定。

四、余论与展望

虽然ANT理论的发展后期越来越“避免”谈论“权力”,但这种“刻意”与权力保持的距离,并非是表面上看起来的“去批判”(dis-critical),甚至被解读为“反批判”(anti-critical)。相反,ANT从未真正回避或对权力失去过兴趣,它所反对谈论的只是被做成先在的、整体性的权力概念,那也是ANT视之为敌的“传统社会学”解释的路径。在ANT的“行动者世界”

中,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绝非既定的、先在的,而是一个由我们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这个“世界”永远是被“简化的”,它正在实施“简化”或是一个阶段的“简化”已告一段落。“简化的世界”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和界定正在这个“简化”的进程中获得,这就是ANT的权力机制——力与力的联结、所遭遇的抗衡、策略与诡计……

传播学不能抽象或笼统的谈论媒介物,比如把一切媒介都统称作“非人行动者”,把手机、笔记本、新闻、会议、出版物、宣传手册都笼统的混在一起;相反,我们需要先在ANT的框架中去界定“媒介物”,然后再试图把界定后的“媒介物”放入“行动者世界”的“简化”权力机制中去考察。换句话说,如果要在ANT中谈论媒介物,该怎么谈?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作为“物质化”的媒介物,其二是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对于前者,“物质化”不能与“非人行动者”混淆起来,不能狭隘地认为只有“非人行动者”才需要“物质化”,而是只要想成为强力的行动者,就必须具有强大的“物质化”媒介物的能力,让行动素之间的“联结”成为可能,并使之稳定下来;对于后者,“中介”的媒介物则意味着一场“新”的事件、运动的生发,作为中介的媒介物并不是表征的符号,而是创造,是对事物属性和身份的界定。这两类媒介物分别参与进“简化”世界的权力机制之中,“简化”归根结蒂是对某种要素组合的联结形态的固化,在某种特定的组合中,某种“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自然的/科学的”“真理”向我们显现,我们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而这些“确凿的事实”只是运动的结果。因此,对于ANT来说,简化永远是在过程之中,一个阶段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终结,它还会遭遇到抵抗,世界可能会被重新书写。

注释:

①③Jan Teurlings. Unblackboxing Production: What Media Studies Can Learn from Actor-Network Theory. In M. De Valck & J. Teurlings(Eds.), After The Break: Television Theory Toda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2-75, p. 74.

②④⑦Nick Couldry.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Internati-

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Philosophy. Klaus Bruhn Jensen and Robert T. Craig(Editors- in- Chief), Jefferson D. Pooley and Eric W. Rothenbuhler(Associate Editors). USA: John Wiley & Sons. 2016. p. 6, p. 3, p. 5.

⑤ Joost van Loon. Media Tech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Maidenhead, UK: Open UP. 2008. p. 113.

⑥ 例如拉图尔在这篇文献中的主题: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例如拉图尔在这篇文献中的主题: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 2004. pp. 248-255.

⑦ 例如加里蒂这篇文献的主题: Karin Garrety. Social Worlds, Actor-networks and Controversy: The Case of Cholesterol, Dietary Fat and Heart Diseas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0, no. 2, 1997. pp. 727-773; 例如瓦克曼这篇文献的主题: Wajcman J. Address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Theory, Current Sociology, vol. 50, no. 3, 2002. pp. 346-363; 例如柯林斯这篇文献的主题: Collins, H. M. Performances and Arguments: Book Review of Bruo Latour, The Modern Cult of the Factish Gods, Matascience. 2012. pp. 409-418.

⑧ Whittle A, Spicer A. Is Actor Network Theory Critique?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9, no. 4. 2008.

⑨⑪⑬⑭⑯⑰ Bruno Latour. On recalling ANT, John Law & John Hassard(eds),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Blackwell. 1999. p. 15, p.37, p. 39, p. 17, p. 18, p. 19, p. 21.

⑩ Bruno Latour. On Actor- Network Theory: A Few Elarific- ations. In Soziale Welt, 47. Jahrg, H.4, pp. 369-381. Published By: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1996. p. 369.

⑫ Dudhwala, Farzana. What is Actor- Network Theory? What are i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as a form of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UK: academia. edu/542543/What_is_Actor- Network_Theory. 2009. p. 9.

⑬ Noys, B. The Discreet Charm of Bruno Latour J. Habjan and J. Whyte(Eds.)(Mis)readings of Marx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Outhwaite, W. 2009. p. 207.

⑭ Michel Foucault. 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 In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1977, Colin Gordon(ed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 170.

⑮ 张一兵:《回到福柯》,《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第40页。

⑯ [美]卡利斯·雷塞沃斯奇思:《系谱学批判:米歇尔·福柯

与思想体系》,傅修延译,《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5期,第94页。

⑰ Bruno Latour. Socrates' and Callicles' Settlement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Impossible Body politic. Configurations, vol. 5, no. 2, 1997. p. 240.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32, p. 39, p. 45+107, p. 81, pp. 79-81, p. 86(n106), p. 181(n237), p. 181(n237), pp. 181-182.

㉔ [英]大卫·英格里斯,克里斯托弗·索普:《社会理论的邀请》,何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344页。

㉕㉖㉗㉘ Michel Callon. 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 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n Michel Callon, John Law and Arie Rip(Eds.).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Pgs 19-34).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p. 23, p. 28, pp. 27-28, p. 28.

㉙ [法]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璇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

㉚㉛㉜ Michel Callon and Bruno Latour. 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 How Actors Macro- 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to do so. In K. Knorr- Cetina & A. 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RLE Social Theor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soci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1. p. 293, p. 286, p. 287.

㉝ Michel Callon.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2, no. 1_suppl, 1984. pp. 196-233.

㉞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Joseph Ward Swai). New York: Free Press. 1915/1947. pp. 230-231, p. 233.

㉟㊱㊲ 林文源:《看不见的行动能力:从行动者网络到位移理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14年版,第140-141、399页。

㊳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 2004. p. 246.

㊴ Janine Randerson. Material Matters: Stories of Learning Technology Transfer. Critical Arts South- 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vol. 25, no. 2, 2011. pp. 227-241.